



刘擎校
罗德之著

柏拉图的政治理论

以及施特劳斯与沃格林的阐释



PLATONIC POLITICAL THEORY

James Rhodes

上海书店



北大讲稿

柏拉图的政治理论

以及施特劳斯
与沃格林的阐释

[美] 詹姆斯·罗德之 著

刘 擎 校 张新刚 译

Platonic Political Theory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柏拉图的政治理论, 以及施特劳斯与沃格林的阐释: 北大讲稿 /
(美)罗德之著; 张新刚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2.2
ISBN 978-7-5426-3717-8

I. ①柏… II. ①罗…②张… III. ①柏拉图(前 427~前 347)—政治
理论—研究 IV. ①B502.232②D0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8891 号

柏拉图的政治理论, 以及施特劳斯与沃格林的阐释: 北大讲稿

著 者 / [美]詹姆斯·罗德之(James Rhodes)

译 者 / 张新刚

校 译 者 / 刘 擎

策 划 / 严搏非

责任编辑 / 黄 韬

特约编辑 / 李伟为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版 次 /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80 × 1240 1/32

字 数 / 111 千字

印 张 / 4.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3717-8 / C.411

定 价 / 23.00 元

序 言

这几次讲座简要概述了柏拉图的政治理论,并讨论了20世纪两位柏拉图最卓越的读者——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与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对其理论的阐释。讲座于2007年4月在北京大学举办,参与者主要是来自不同学科的低年级研究生、博士候选人以及教授。这次演讲的任务是艰巨的,要使这三组不同的听众能够理解演讲的内容并不容易,而更为复杂的情况来自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许多具有影响的西方思想家误解了柏拉图的思想,导致整个一代学生误入歧途,确信自己了解了他们实际上不了解的东西。这种误解几乎被所有人接受,曾经也包括我自己,但误解必须首先被澄清,才可能展开富有成果的分析。

柏拉图在其“第七封信”中对他自己所发表的著作有过一段告诫。而有关柏拉图政治理论的种种错误观点的根源在于对这段告诫的意义的无知、漠视以及争议。柏拉图说,叙拉古的僭主狄奥尼修二世及其奉承者不可能理解“我严肃对待的事物(*perion ego spoudazo*)……因为,我的写作没有论及这些事物,也将永远不会有。因为不像别的教益那样,这是无可言说之事(*hreton*

2 柏拉图的政治理论

gar oudamos estin hos alla mathemata)”(341c1 - 6).[1]显然,这段陈述会引发一个基本的阐释学问题:如果柏拉图本人声称他的对话录中没有他“严肃的”见解(也就是他关于最高真实的思想),那么我们可能从柏拉图的对话录出发抵达他深邃的真理吗?对于这个问题的特定考虑,形成了三个不同的阐释传统。

在第一个传统中,柏拉图的一些注释者显得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另一些可能是装作对此一无所知,还有一些则明确拒绝柏拉图将他自己的写作称作“不严肃”的描述。这些解读者都将柏拉图的文字作为当真的论述来处理。落入这个传统之下的有一些非凡的人物,例如,亚里士多德(他可能是装作对此无知),第欧根尼·拉尔修;中世纪神学家费奇诺;康德;黑格尔(他意识到柏拉图的那段评论但拒绝接受);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和美国的文献学家(如布利,康福德,乔伊特和肖里);以及海德格尔、波普尔、阿多诺和弗拉斯托斯。在我看来,这些学者对柏拉图的不同陈述提出了有学识的分析,但最终错失了他的要点,臆造出各种互相矛盾的、但并不存在的所谓“柏拉图主义”。常常有中国学生问起,我会将斯金纳归于哪个传统?我的答复是,斯金纳并没有特别关注柏拉图,因而不可能特别确定(如果他关注的话)他会属于哪个传统。但是,他所依托的理论——特别是他对永恒问题的历史主义否认,以及他对其研究的各种思想中的真理的漠视——会使他不认同柏拉图对于“严肃”(the serious)与“不严肃”(the unserious)的区别之意图,因此,他及其学派可能会被置于这第一种类别。

在第二个传统中,柏拉图的阐释者认识到柏拉图的告诫,但将其

[1] 在本系列讲座中,对柏拉图著作的引用都是依照 Stephanus 页码,其他著作也是同样。

意义解释为他在用隐微的方式写作,并认为有必要在他公开的(显白的)陈述背后去获得他私下持有的(隐秘的)的真实陈述。这个传统中的学者们对于从显白言说抵达隐秘教诲的适当方法并不总是能达成一致,对于隐秘教诲的实质性内容也具有分歧。这个传统的人物包括普鲁塔克、圣·奥古斯丁、法拉比以及追随他的阿拉伯学者,迈蒙尼德、莱辛、特曼、尼采、施特劳斯,以及“施特劳斯派”的克罗波西、伯纳德特、布鲁姆、潘高和罗森(虽然罗森最近论及柏拉图的著作逐渐偏离了这个立场)。亚里士多德或许也属于这个类别。我不认为这些学者对柏拉图的看法是正确的。然而,由于他们依据极为细致的文本解读,他们对柏拉图对话的处理分析是非常有价值的。

在第三个传统中,柏拉图的解读者将其告诫理解为他的真理是不可言说的。几位杰出的博学之士持有这种观点,他们是施莱尔马赫克尔凯郭尔以及沃格林。我自己作为一个次要人物属于这个传统。我的这些演讲将阐述这个传统的“不可言说之洞见”的概念对于理解柏拉图哲学以及柏拉图最高真理的性质所具有的意义。

当然,要在几次讲座中恰当地阐明这个复杂的论述是困难的。读者若有意想要了解我更充分完整的对柏拉图解读的论证,请参阅我的英文著作《爱欲、智慧与沉默:柏拉图的爱欲对话》(*Eros, Wisdom, and Silence: Plato's Erotic Dialogues*)。

我相信,虽然施特劳斯在中国很流行,但他隐微写作的意义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沃格林目前在中国实际上还不为人们所熟知,但由于有分属四个不同机构的学者们正在翻译他的《文集》,这一状况正在发生变化。如对柏拉图的理解那样,我关于施特劳斯和沃格林的讲座意在提出一些问题,来挑战中西方学者对这些哲学家的看法。

4 柏拉图的政治理论

我非常感谢北京大学李强教授邀请我在北大做这个系列演讲,他极为慷慨好客并多次激发了我们之间哲学的交流,感谢李强教授使我的中国之行智识丰盈且充满文化气息;感谢华东师范大学的刘擎教授将我介绍给李强教授,并安排将此讲稿出版,感谢他在上海对我的热情招待;还要感谢严搏非先生欣然出版这个讲稿,还有在上海的美食与智慧款待(这次宴会变得像是21世纪的一场“会饮”)。感谢北京大学两位博士生丁凡和张新刚在北京对我的照顾以及我们之间的交流讨论,特别感谢张新刚的辛苦翻译工作以及刘擎对译文的细致校对和修订。感谢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成庆,两年多来我们一直通过邮件进行着充满激情的哲学对话,感谢他一个月在北京和西安的陪伴。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同样使我的访问非常愉快,讲座后的问答环节非常有启发且生动,我也从中受益良多。他们本身就非常优秀,又是被精心选出且受到了老师们的良好教导。

罗德之

于密尔沃基

2007年5月21日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讲 柏拉图哲学的性质	/1
第二讲 柏拉图:不义的难题	/17
第三讲 柏拉图:爱欲失序的难题	/34
第四讲 柏拉图:灵魂的正确秩序	/50
第五讲 柏拉图:永恒正义的政治实现	/66
第六讲 施特劳斯:身为隐微书写者的柏拉图	/81
第七讲 沃格林:柏拉图与意识哲学	/98
第八讲 沃格林:柏拉图与历史哲学	/116
译名对照表	/132
校译者后记	/140

第一讲

柏拉图哲学的性质

柏拉图是最著名的、同时又是被理解得最少的西方哲学家。我知道说这句话似乎很傲慢,好像我是在说,自己是整个西方历史上能胜任解读柏拉图的极少数人之一,但请相信我并不是要做如是宣称。事实是我并没有很好地理解柏拉图,而且我怀疑在我有生之年,我或者任何别的西方人能够把握他的思想。

我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柏拉图在世的时候就断言,他的思想被那些装作是其门徒的人歪曲了。我猜测这一情况从未被纠正过来。因此,我接受埃里克·沃格林的论旨——柏拉图的哲学被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派扭曲了,后来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被完全毁掉,今天的西方哲学沦陷于废墟之中,我们迫切需要收复在这千年毁坏过程中所遗失的东西。然而,我要承认自己仍未复原柏拉图的洞见,并要表达一种担忧——没有哪个西方人,包括我自己在内,能够完成这种复原工作。

为什么西方人很难或者说不可能恢复柏拉图的哲学呢? 这里有两个难题。

首先,因为延续着一个长期的破坏性实践,于是在我们进入柏拉图之时就带着有关哲学应该是什么的预定偏见。我们阅读他是为了寻求我们想要他提供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有找到,就想象他有缺陷。

2 柏拉图的政治理论

这里可以给出几个这种方法误导的例子：康德在《近来哲学界最高贵的声音》(*Von einem neuerdings erhobenen Ton in der Philosophie*)一文中假定，哲学工作就是要通过推论的知性方法来分解和重建所有概念。柏拉图并没有那么做，所以康德就批判柏拉图的哲学，是从概念直接跳到无概念所及的不可思之物当中，是一种神谕般的迷狂 (*Schwärmerei*)，而这就是所有哲学的死亡。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中认为，哲学的任务是阐明一个科学的体系，它展示思想必然的发展过程直至其在理念中的实现。他想用清晰明确的陈述来阐明这一体系。但黑格尔看到，柏拉图经常诉诸神话，并且柏拉图的著作也没有发展出系统的命题性的逻辑，他就判定柏拉图的努力是幼稚的和非科学的。他提出要重构柏拉图的哲学，方法就是舍弃它的对话形式，并将其多变的格言重新安排为更为理性的论证，这种论证能被理解为是迈向现代科学的原初的蹒跚步伐。尼采则坚持主张，哲学的任务是勇敢地面对无意义之存在的恐惧，废除一切价值，为价值创造而解放权力意志。在《偶像的黄昏》(*Götzendämmerung*)一书中，他指控柏拉图逃避这些责任，并称他是堕落的征兆，是在现实面前遁入理想中的懦夫。格利高里·弗拉斯托斯 (Gregory Vlastos) 可能是 20 世纪美国最著名的柏拉图研究学者，他似乎将哲学等同于分析命题的有效性。在他的《柏拉图研究》(*Platonic Studies*)中，他经常揭示他所认为的柏拉图学说中的谬误，并探究倘若柏拉图更好地理解了他自己的理论又会是怎样的情况。在《政治理论》一书中，实证主义者阿诺德·布莱希特 (Arnold Brecht) 要求哲学遵循现代科学方法，这种方法会产生建立在经验证据之上的主体间可传达的命题。他轻率地将柏拉图和大多数其他哲学家拒斥为非科学的。

我怀疑西方思想的这些代表人物中是否有任何一位把握了柏拉

图的最高洞见。他们关于柏拉图应该做什么的先入之见使他们熟视无睹,无法认识柏拉图做了什么。大多数西方人都陷入与他们同样的命运。我们极为迫切地渴求科学的确定性和存在的自主性,这促使我们趋附那些杰出思想家对哲学的一贯要求,并使得我们无视一切不能满足我们的事物。要想懂得柏拉图成就了什么,我们必须摆脱我们自己的偏好和前见,这并非易事。

阻碍我们理解柏拉图的第二个困难源自柏拉图哲学自身的性质。这是我今天想要讨论的内容。现在能看到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一封信,据称是柏拉图在狄翁遇害后不久写给他同伴们的信(狄翁是柏拉图挚爱的朋友)。这封信按照希腊语被归为“Z”,英语称之为“第七封信”。这封信的真实性一直受到争议,而质疑的依据却是极为可疑的——它的书写风格不同于柏拉图对话的语言。我认为这封信是真作。在这封信中,柏拉图作出了一个惊人的断言。在谈及那些自诩为他的门徒的伪哲人时,他说:

对那些宣称自己知道什么是我严肃对待的主题的所有写作者或以后的写作者——不管他们是我的还是其他老师的听众,抑或基于他们自己的发现——我可以非常确定地宣告,至少依我的判断,这些人根本不可能理解这一主题。我的任何写作中从不曾有过、将来也不会有处理这一主题的文本。因为它完全无法像其他学问那样可以言说,而是作为与其自身不断同在与共生的一种结果突然在灵魂中出现,犹如迸发的火花一样闪亮,而后它保有自身。(341c-d)

我们困难的实质在此不言自明:如果柏拉图严肃对待的主题不

4 柏拉图的政治理论

能用言语来表达,如果柏拉图从未严肃地写作(或言说),那看起来就不可能领会他严肃的哲学。怎么能有人通达柏拉图的哲学呢?这提出了一个相关的问题:如果柏拉图的那些对话录并非当真(严肃),那他为什么要写那些对话呢?为什么我们要费劲儿地阅读它们呢?〔1〕

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必然的初步回应,就是假定柏拉图不可能真想要否认他的写作是严肃的。这也一直是大多数西方学者的反应。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他们将柏拉图对话录当做是“柏拉图言说”的精华。他们惯常会在柏拉图文本中找到一套严肃的教诲,并称之为“柏拉图主义”,尽管柏拉图声明过自己并没有发表过这样的学说。这使得柏拉图所不满的那种对其著作的曲解永远存续下来。这肯定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柏拉图对于自己的沉默是当真(严肃)的,所以他的对话录并没有断言任何严肃的事情。柏拉图拒绝将他的哲学付诸语词,他煞费苦心地为这种拒绝辩护:

〔1〕 2007年4月20日我在上海复旦大学也做过这个讲座。在讲座上就此观点,一个复旦大学学生反对柏拉图不可能有不以逻各斯方式阐发的严肃的哲学思想。诉诸“哲学”,他指出柏拉图否认曾发表过任何关于其严肃思考的文字(*Suggramma*),他坚持认为,因为文本(*Suggramma*)在其他对话录中被归给了普罗塔哥拉,很明显柏拉图意思是只否认他曾发表过关于该主题的任何智者式文本(*Suggramma*)。我不知道这种观点在中国有多大范围的受众,我这里对此做一简单回应。我认为这个反对是不合适的。*Suggramma*是一个常用的希腊词汇。柏拉图并没有使用常用词来表达专门术语,也没有证据表明他想通过提及普罗塔哥拉的一个文本来这么做。进而言之,必须要记住柏拉图还说了他的严肃的真理是 *hreton gar oudamos estin hos alla mathemata* (“绝不可能像其他学问那样可以言说”)。我猜想我的批评者可能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影响,海德格尔将柏拉图视为是一个次于亚里士多德的先驱,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才是逻各斯。但是海德格尔错了。柏拉图要更为高明。

假如我相信这些主题应当用书写或言说来对公众做充分的阐述,那在我的一生中,除了去写下那些对人类大有裨益并阐明事物本性的著作之外,还有什么我能履行的高贵行动呢?但我认为,要是我承担了这一任务,最终对人们来说不会是一件好事,除了对少数几个只需稍加指导便能够自己发现真理的人之外。因为对其余的人而言,在有些人看来,这个任务最不合时宜地充满了错误的不敬,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怀着自负而空洞的渴望,好像他们已经学到了某些高贵的神秘之事。(341d-e)

要正确地理解柏拉图,我们必须探知他的哲学为什么以及如何是沉默无言的(wordless),要去探明为什么他会认为任何想要言说这种哲学的企图都会遭遇不敬或者制造出一种自欺的狂热。幸运的是,柏拉图对此做出了解释。他的理由可以用两种相反的方式来分析解说。现在我将对此给出我自己的阐释,并在第六讲中告诉你们另外一种阐释。

柏拉图对其哲学的解释有一个政治背景。柏拉图的朋友狄翁废黜了狄奥尼修二世,他是叙拉古(位于西西里东海岸的一个希腊城邦)的僭主。作为主政者,狄翁直到被刺杀时都在一直努力要带给叙拉古正义的法律。狄翁好战的同伴们写信给柏拉图,宣称他们拥护他的理想,并敦促柏拉图支持他们筹划反政变的努力。柏拉图回答说,只有当他们真正像狄翁一样奉献于自由和最好的法律,自己才愿意帮助他们。但是,致力于狄翁的事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并不是聆听它所表达的、对它怀有热心并确定信奉它就够了。除非人们能在向哲学上升的过程中获得自己的确信,否则他们不会真正地自由和最好的法律而献身。因此,柏拉图对他的通信者谈起了狄

6 柏拉图的政治理论

翁观点的渊源。

按照柏拉图讲述的故事,狄翁的意图出自两个成对的源头。柏拉图经常声称,第一个源头是神圣的。柏拉图在《第七封信》的几处地方重复说,只有“经过神圣的使者”和“通过神圣安排”、“神圣的命运”和“神赐机遇”,才可能持有真正的意见和拥有好的目的。因为人类社会已经普遍腐败了,并通过反面例子将邪恶的愿望一代代传递下去。易受影响的年轻人实质上不可能抵抗文化影响所产生的毒害。柏拉图的话很类似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对公众教育毒害作用的评论:“不可能通过接受一种逆反公众方式的教育来造就一种不同的美德品性,这种事情现在没有,过去不曾有,将来也不会有。噢,朋友,这是人力不可及的事;至于神祇的情况,如俗语所言,那就另当别论了。因为你应该很清楚,在当下政体的状况下,如果有什么品性得以幸存并成为它应当所是的那样,那你可以说这是神力的护佑,这么说是不会错的。”(492e - 493a)

这里,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并不是想说神从天插手人间,用惊人的神迹创造或拯救一个好人。实际发生的是,一个潜在的高贵的孩子在世上出生。由于神,或者,你愿意的话,由于偶然的机遇,这个孩子天生禀赋,博闻强记,勇敢无畏,追求真理,愿意放弃基本享乐,接受伦理德性的命令——哪怕这些德性的基础是晦暗不明的,拥有着稳重的性格。然后,由于神性或者好运,这个孩子与文化的影响隔绝,并被有德性地教育着。他或者她有时间让德性和真正的知识浸透灵魂,并在灵魂中变成不受影响的习惯或第二本性。只有享有这些神爱并接受到如此前哲学教育的年轻人才能真正分享狄翁的承诺。其他人可能经历过对其筹划短暂的热情,但他们在权力诱惑的面前不可能保持自己的意图稳固不变。我们都读过历史,知道人们经常真诚地声称为了理想去掌权,而在到达权力顶端的时候便抛弃理想,变

成了罪犯和僭主。正是这一可怕的现实使得柏拉图主张神圣的天命、异常的天赋和坚强的灵魂、强健的前哲学道德训练对于真正的、持久恪守自由和良好立法承诺的人是绝对必需的。

狄翁所受的神赐、性格和教养对于他意见的产生是必需的,但并不足够。柏拉图暗示说,他自己年轻时的经验也是狄翁对自由和最好法律承诺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柏拉图年轻时,他相信自己和大部分雅典贵族青年一样都会从事政治。但是,当公元前404年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将雅典打败后,斯巴达将三十僭主强加给雅典。其中的一些暴君就是柏拉图的叔叔们。柏拉图曾希望这个新政府能够公正地统治。但事实恰好相反,这个新政府是压迫性的。新政府进行了令人发指的杀戮,并试图强迫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参与他们的滔天罪行。柏拉图脱离了政治。接着,在民主革命推翻了三十僭主之后,民主派又杀害了苏格拉底。这使得柏拉图得出了四个结论:所有的城邦都差不多无可救药地败坏;没有真正的朋友不可能从事政治;正是通过正确的哲学,人能够认识到个人和政治的各种形式的正义;除非哲学家当统治者或者统治者变成哲学家,否则世上的邪恶不可能中止。柏拉图的经验 and 结论对于狄翁的观念是必要的,因为狄翁的神赐天赋和孩童教育没有将其变成一位哲学家。没有哲学,他不能分辨真假朋友,不总能辨识出正义,也不能知道如何为最好的法律效力。在狄翁形成他的筹划之前,柏拉图必须与他相遇,并开启他下一个阶段的教育,将其推上通向哲学的道路。

我们应简要思考一下年轻的柏拉图从其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将“真正的朋友”设想为狄翁这样享有神赐德性、稳固性格并曾受到前哲学道德训练和以后会受到柏拉图设想的哲学教育的人。“假朋友”是那些竭尽全力声称自己致力于自由和最好的法律、却深受习俗文化塑造、缺乏哲学洞察力、从而会很快转变为邪恶的那种

人。与这样的人结盟往往是毁灭性的，他们会以背叛和不义告终。狄翁（他从未完成充分的哲学化）与这样的人订约，这就是他被刺杀的原因。现在我们必须向柏拉图发问：“通过正确的哲学，人能够认识到个人和政治的各种形式的正义”是什么意思？有人可能会认为“正确的哲学”是正义的命题理论，包含有许多可以像技术手册一样遵循的关于好的和坏的行为规则，可以随时随地拿出来使用。如果这是真的话，假朋友的问题就可以通过教给每个人正确的哲学来解决。如果政治如此简单的话，那实在是太好了。然而，正义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而这正是使得柏拉图哲学变得沉默无言的关键点之一。柏拉图并不拥有，比方说在罗尔斯六百页的书中你所能找到的那种正义的命题理论。在我的下一讲中，我们将会看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并没有如它在大部分西方大学里被相信和讲授的那样，提供这样一个理论。正确的哲学根本不是一系列的实证、定义和戒律，正确的哲学是灵魂中的某种东西，它能帮助我们发现在每一个具体情形下正义需要什么，更像是无论我们在地球的什么方位，指北针总指向北一样。正义在城邦中的实现不是一个理论被应用出来，而是正确哲学的特殊决定，那是尚未说明之物，从哲人王的灵魂中日复一日地流溢至社会秩序。我们必须学习可能所是的这某种东西：正确的哲学。

下面我们继续考察，来思考柏拉图关于其严肃哲学所说的话：“因为它完全无法像其他学问那样可以言说，而是作为与其自身不断同在与共生的一种结果突然在灵魂中出现，犹如迸发的火花一样闪亮，而后它保有自身。”如果它是“完全无法言说的”，那我们就不期望能用语言来确切地定义它。那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做柏拉图自己所做的。我们可以试着如柏拉图那样“不断与其同在与

共生”。为了要表达这种与其同在与共生的结果,我们可以使用明喻、隐喻和神话。当柏拉图说严肃的见识是“突然在灵魂中出现,犹如迸发的火花一样闪亮”时,他就采用了明喻。明喻、隐喻和神话,都不是精确界定物质本性的科学命题,而是提供给我们那些言说者已经拥有、而我们还未拥有的经验内容的大致想法。比方说,你和一个从未吃过中国菜的西方人说“莲藕和萝卜味道相仿”。这并没有抓住莲藕的真实味道,但是这会使得听者尽可能地通过自己知道的味道来想象,直到自己吃到莲藕为止。所以,如果我们以柏拉图的方式与之同在和共处,我们尽力构想他所描述的经验时必须留意他的明喻、隐喻和神话。在当下这个例子中,我们必须想象灵魂经验到如同眼睛被亮光照亮的类比。我们只能尽力去想象。我们也必须准备好自己去经历柏拉图的经验。我不能说我自己曾有过他的经验。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宣称自己完全理解柏拉图的最主要的原因。

当然,这引发了新问题。柏拉图建议我们“与之同在和共处”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我相信,对于柏拉图来说,那就是他对自己灵魂之抵抗的惊奇,这是对他雅典所经历的不正义的抵抗。我推测,他看到了一些他知道是极端邪恶的事情,然后自我反思地问自己,他是否以及如何真确地知道他认为自己知道的事情。对这个问题的反思引导他对灵魂、知识和存在的自然(nature)和秩序(order)进行更深的沉思。我们自己的哲学事业可以被同样的抵抗不义的经验或者对存在之神秘的任何惊讶所激发。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相关联的。

如果上述所言为真的话,我们应该如何“与之同在和共处”呢?是否有法可循以让光也在我们灵魂中闪耀?

柏拉图在进一步解释他的哲学时帮助我们面对这些问题。他说,存在一种真正的论证(a true argument),对此他经常重复如下:对于每一存在的知识来说有三种东西是必需的。第一个是名称(ono-